

评史丛录

『新时期』史学理论之我见

学风与学术批评

历史研究的新实证主义诉求

新人本主义的『人—自然』观

明史以外看明史 —— 关于明史研究范式的几个问题

关于『新清史』的对话

明清史期刊论文的写作与评析

赵轶峰

著

 科学出版社

海外借

评史丛录

赵轶峰
—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学术评论是学者思想探索和学术共同体交流的重要途径。本书是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赵轶峰教授近十几年间所写具有评论、交流性质文章的选编,分为“当代史学”“史以经世”“明清中国”“文明史观”“序文”“教学相长”六个部分。内容涉及对当代中国历史学研究状态的分析、对行政化学术评价体系的批评、对新实证主义史学的阐释、从历史学角度对当代人类社会共同体建设的思考、对明清史研究若干重要动态的评价、对文明史观和全球史的分析、为青年学者著作所写的序言、求学与教学心得的回顾。各篇长短不一,事理、行文皆称晓畅。读者阅读此书,既可从了解赵轶峰教授在史学理论、明清史、文明史领域的一些独到的学术主张,也可据以揣摩一些研治历史的经验。

本书适合对史学理论、明清史、文明史领域感兴趣的广大读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评史丛录 / 赵轶峰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03-059068-8

I. ①评… II. ①赵… III. ①史学-中国-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2862 号

责任编辑: 耿 雪 / 责任校对: 张小霞

责任印制: 张 伟 / 封面设计: 黄华斌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 年 10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B5

201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2 1/4

字数: 316 000

定价: 8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自序



历史研究者或多或少需是一个思想者。他们要推究过去发生的一些有重要性的人类事务，澄清原委，透彻阐释，帮助当下的人们理解以往的经验，同时呈现研究同类经验合理有效的方法。这需要他们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否则就可能沉浸在职业性和专业细化导致的技艺情结和习惯中，做虽然精细但无关宏旨的研究。研究历史的人，需要钻研一些理论，容或不能深湛，也需多加浸润；要自己独立地思考一些关涉研究理念的根本问题，即使难以突破前人所见，仍要持之以恒，使之入心，从而不至于被东西南北各种风潮随意裹挟而走。同样重要的事情是，治史者在精神上应该特立独行，在工作方式上不可以闭门造车，应该评价同行的工作，欢迎同行批评自己的工作，使自己的思考和研究与同行的研究汇流，在学术共同体的话语环境中评价自己，品味心得，在交流与批评中磨砺研究的锋芒。

这些事情，说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在我年轻的年代，难在教条太多，成见太深，资讯也远不如现在丰足。最近这些年，条件好了许多，但也有一些妨碍的因素。比如评价体系持续地给学者造成定向压力，让其快出成果，为所在研究机构的排名做出贡献，于是学者多以在“高级”刊物上发表作品为目标，很少关心对已发表作品的评论。再如资讯发达环境容易形成一些人为的热点，容易炒作出一些学术“时尚”，造成一些评估、评价的幻觉。所以稳健的人文学术评价机制，至今也不能说已经形成。前几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彭卫先生有感于此，创建《历史学评论》，以书代刊。只出版了一卷，就因高品质稿件不足而难以为继。唏嘘之余，不免反躬自省，我们许多看到这些情况的人，其实自己也没有在史学评论方面做很多事情。良好的史学生态，不能缺少稳健、常态化的史学评论。史学理论研究本身，尤其就是批评性的学术。我们是要在这方面多用些心力的，此书取名《评史丛录》，立意也在于此。

这本文集，是我在最近十几年间所写的具有评论、交流性质的文章选编，其核心自然是历史研究，其中有些文章略为超出历史学范围，涉及对现代社会原理和状况的基本理解，但观察和思考的原点仍在历史学。更早时期的同类文章，已收入《学史丛录》和《明代的变迁》，不入本集；近年所作有关韩国、日本、印度史学理论的文章，需要另外集结作为两个“亚洲史学理论”项目的成果，也没有收入此集。故而，此集是由未收入我的其他个人文集和将要单独署名出版的史学理论专题书籍之外的评论、交流性文章构成，故称“丛录”。编排时做了大致的分类。

第一组“当代史学”5篇，核心在于提出我对于当代中国史学研究基本观念的看法，主张包括：中国史学理论需充分关照国际水平并谋求在史学认识论方面提出独到主张，不当执意纠缠数十年前反复讨论的话题；当下行政化学术评价体系严重误导、扭曲史学研究，应将学术评价主体地位还给学术共同体；历史研究稳健可取的路径可以概括为“新实证主义史学”——该话题在我看来至关重要，将来可能扩展成书，详细论证。

第二组“史以经世”8篇，即前面所说略为超出历史学的部分，这部分是2000年我回国以后最初10年前后写成的。当时我参加国际性文化及学术活动较多，主编了几本在全球化语境和现实参照视野下思考现代社会建设的文集，略有为人类社会共同体建言的意思，在思考历史问题时，常取发散式的思维。其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文章对我自己的钻研说来是很重要的。启蒙时代形成的人与自然关系论是一种自然工具论，而晚近一些自然权利论者则取消人的主体地位，二者皆需加以反省。我思考的结论是应该建立一种“新人本主义”的“人—自然”观。这虽然并非直接讨论

历史学家的工作方式，但以史家“究天人之际”大意衡量，是应有之义。关于责任伦理的文章，初看主要从伦理角度立言，实际上是把中国历史上的责任伦理与当下世界范围的伦理意识反思结合起来讨论。我以为，对于中国文化的思考，就应该在当代人类心智反思和社会建设的层面，而不应仅仅作为一个民族自己的偏好。关于“天下为公”的思考，着眼处与前面说到的两篇类似，只是更直接地落脚在史的意蕴中。关于基督宗教在东北地区流传的文章，主要是结合学术史的梳理，提出一些该领域研究问题取向方面的建议。

第三组“明清中国”8篇，是结合自己研究较多的明清史，从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角度做出的对若干动态的评论。主张包括：明史研究需有超出明史的宏观理论视野，一些曾被视为权威的言说其实是在特定历史、学术语境中提出的，各有用意，不应过分推崇；明清江南研究的一些流行方式包含误区，需加分辨；对明代白银货币的研究不能只关注其为贵金属，且需关注其为称量形态；故宫学与明清政治史研究可以互补；明代官廷典制在中国官廷典制史上有特殊地位；明代官廷是权力高度支配的空间，官廷生活史研究与一般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意识需有差别；万明对于《万历会计录》的整理与研究是一项很大的学术贡献。

第四组“文明史观”收入4篇文章。其中两篇结合《全球文明史》的翻译梳理关于文明史研究方法的心得，一篇讲述我组织编写的简本《中华文明史》的编纂思想，另一篇是就近年我提出的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中采用文明史视角所写的一篇备注性的文字。其实，这几篇文章还没有把文明史观的要义彻底说清，还应该继续思考。如在本书后面有关“新清史”的一篇对话中，就略微涉及文明史观如何有助于理析中国历史上的多民族国家的问题。

第五组“序文”收入的5篇文章主要是为同事、学生著作所写的序言，以指出各书的基本学术主张和特征为主，并表达一些延伸的思考。此外还有为《古代文明》中文版所写的发刊寄语。

第六组“教学相长”5篇，是在求学和教学生涯中形成的自觉有意义

的文字。李洵先生是引领我走入明清史研究领域的导师，他的治学为人，一直是我求索路上的指引。围绕“王权主义”“新清史”两个前沿学术话题的对话，既呈现了我关于这两个话题的基本看法，也记录了我与青年人共事的意趣和收获。为《明清史典范论文评析》一书所写的绪言，阐述了我对于历史学期刊论文的理解，其中包含对时下一些史学论文风格的想法，或许对研究生的学习有参考作用。最后一篇，是我说给硕士研究生新生的话，讲了对这一阶段的年轻人学习明清史的建议，或可供留意者斟酌采择。

这样的一本书没有什么体系性，但触及当今史学研究的一些重要且意见并不一致的话题，也有一些治学的心得。于我本人，是一次总结。对于初入历史学领域的青年人，若能也有一些梳理推敲时的佐助作用，就更值得欣喜了。

此集编纂蒙惠于多人，文章中多有提及，不在这里一一列出。博士研究生宋兴家、王慧明通读校对文稿，殊为辛苦，特致谢意。

赵轶峰

2017年12月29日于长春

目 录



自序

当代史学

“新时期”史学理论之我见	3
学风与学术批评	9
关于学术史的几个问题	18
关于中国史学研究国际化语境建构的几点看法	22
历史研究的新实证主义诉求	24

史以经世

新人本主义的“人—自然”观

——《当代中国的“人—自然”观》代序	61
--------------------------	----

责任文化的苏醒

——《当代中国思想探索中的“责任”观》代序言	76
------------------------------	----

文明时代的困惑与追求

——《当代文明的困惑与追求——解读〈人类责任宪章〉》序	90
-----------------------------------	----

中欧论坛与中欧知识共同体	101
和平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108
民族国家与近代化	
——20 世纪东亚历史解释的两个症结	115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及其现代回响	123
基督宗教中国东北地区传播社会史研究的问题谱系	
——《文本、地域与解释的新视角——中国东北地区的基督宗教 与中西文化交流（清初至民国）》代序	141

明清中国

明史以外看明史	
——关于明史研究范式的几个问题	157
明清江南研究的问题意识	166
明代白银货币称量形态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含义	178
明代政治的文化张力	
——《权力·价值·思想·治道——明代政治文化丛论》序	186
故宫学的明清庙堂政治文化视域	192
明代宫廷典制在中国宫廷典制史中的地位	199
明代宫廷生活研究的三个基本概念	205
评万明、徐英凯著《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	210

文明史观

《全球文明史》的独特视角	221
《全球文明史》与“世界史”概念的再思考	236
《中华文明史》序	245

应该注重中华文明演进历程中的社会形态研究	250
----------------------------	-----

序 文

赵克生《明代国家礼制与社会生活》序	257
孙强《晚明商业资本的筹集方式、经营机制及信用关系研究》序	260
赵现海《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 长城制度史研究》序	263
刘喜涛《封贡关系视角下明代中朝使臣往来研究》序	267
《古代文明》发刊寄语	271

教 学 相 长

向李洵先生学习明清史	275
关于“王权主义”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对话	282
关于“新清史”的对话	296
明清史期刊论文的写作与评析 ——《明清史典范论文评析》绪言	314
说给明清史硕士研究生新生的话	336

当代史学



“新时期”史学理论之我见^{*}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历史学界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度教条主义和过度意识形态化思维方式与话语氛围进行清理，恢复了对“文化大革命”前若干重大理论性热点问题的学术讨论。但是，这些探讨在重新达到“文化大革命”前所达到的深度临界点之后难以继续推进，不久趋于沉静。相对于其他领域的快速变革，史学界感受到理论贫乏的危机和研究范式突破的诉求。围绕“史学危机”问题的讨论，中国史学理论形成一个探索的热潮。探讨的范围，不仅涉及对“史学危机”本身的理解，并且包括对 20 世纪中期以来提出的影响深远的一些理论性命题的重新梳理，对历史学方法论的尝试性重构，对史学认识论的初步探讨，以及对一些西方史学理论的介绍与诠释。

这场史学理论热潮在中国历史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在当时的史学评论中已经体现出来。香港学者许冠三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出版的《新史学九十年》，已经将这场探讨置于中国新史学近百年推演的总历程中加以介绍和评析。我本人当时也曾借用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关于科学革命的理论指出，当时“史学危机”感预示的，是一场史学研究的范式变革。^①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许多学者对 80 年代的史学理论热潮

^{*} 原载于《史学月刊》，2016 年第 4 期。

^① 赵轶峰、高二音：《当代中国历史学发展趋势评析》，《史学集刊》1987 年第 4 期。

以及其后的史学理论发展做了总结，足以呈现这场学术风潮的原委、成绩与不足。不过，每个人对 80 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理论探索的历程之理解，毕竟还会有不同。对于我本人说来，这段历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己后来三十年的学术道路乃至人生经历，所以总要经常回顾，不时有新的体会。

在我看来，20 世纪 80 年代的史学理论热推出了许多史学理论著述但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典沉淀出来，其最大的意义，毕竟还在于史学界的思想解放。在这场热潮中，中国史学界对“十七年”（1949—1966 年）的历史学和“文化大革命”史学都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的反思，许多史学研究者以自己的方式了解了中国历史学的理论症结，重新确立了自己研究的题旨和目标。有此基础，才有接下来二十多年中国历史学的新面貌。90 年代以后，普遍的理论热潮逐渐平静下来，但史学理论探索并没有停止。大量比“文化大革命”前视野开阔、方法精致、理论更具有深度的史学研究成果被推出，经历 80 年代史学理论热潮的许多青年学者成为历史学各领域的学术中坚，这背后其实有史学理论、意识转变作为重要的基础。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史学理论研究取得的基本成绩，大致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是冲破教条主义；第二是实现中国史学观念、理论同国际学术的衔接；第三是史学理论的多元化；第四是史学理论成长为一个学科。

所谓“教条主义”主要是指被笼统地误解为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苏式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观和历史叙述体系。这种观念和话语体系倾向于规定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价值立场、基本预设和研究的方法，把历史学政治化，把从“经典”中摘录出来的片段言说作为事实证据和衡量史学论证的绝对尺度，以论代史。其极致状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史学中充分表现，而其滥觞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已然涌动。新时期的史学理论探索，大致还原了斯大林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扬弃了语录式的史学论证风格，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论说进行具体的核实与评析，更多地依据历史本身的证据来解释历史，把对中国历史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解和体系性叙述更多地置于中国历史演变的实践和史实证据基础上。没有这一步发展，中国历史学的学术存在和中国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只在有无之间。

史学状态是社会状态的一部分。20 世纪 80 年代前的中国历史学，虽然不是完全封闭的，但具有很大程度的封闭性。外部的历史学，尤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历史学经常被直接冠以“资产阶级”的帽子，基本只能批判，不能阐发和借鉴。久而久之，中国史学界与西方史学界之间早已不是联通的学术共同体，而是各自言说的两个世界。新时期的中国社会趋于开放，历史学丝毫没有落后，大量国外史学著述被翻译出版，诸多国外史学理论得到评介，许多国际性协作研究展开，大批学者到国外进行交流研究，一些中国历史著作被介绍到海外，中国许多史学研究者的视野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与技术水平已浸浸然接近国际水平。正是在这样的进展中，中国史学研究者诠释中国历史的理论自信才有可能坚实起来。

史学作为一种学术，是探索性的。所有的探索都不仅包括对研究对象的钻研，也包括对研究方式的钻研，所以良性的史学生态必须是多元化的。这种史学生态，在新时期得到培育。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证史学、历史人类学、后现代史学、微观史学、社会史、女性史、文明史、全球史、社会经济史、政治文化史、心态史，等等，各种风格、观念、方法、取径差异的历史研究都能得到阐发，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都在历史研究中有所表现，甚至形成了若干有独到理念和标志性成果的学派。这种史学生态，比一元化的史学生态更有创造力。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中国史学，虽然注重理论，但史学理论从来没有学科地位，史学理论成果基本是一般历史哲学的衍生品，或者是部分历史学者旁及的产品。在过去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史学理论的独立地位得到认可，许多高校建立了史学理论硕士、博士人才培养体系，一批专业史学理论学者已经被培养出来，一些专业史学理论刊物或期刊栏目稳定下来，纯粹史学理路的探索推出了日益增多的成果。这也是中国史学理论乃至中国历史学长期发展的潜力所在。

如从发展的眼光看，三十年史学理论的成绩也伴随着一些问题，而且问题常常与成绩纠结在一起。教条主义不再作为一种观点而是作为一种思维惯性，依然时时表现出来；史学理论与世界史学界虽然接近全面接触，

但是缺乏直接的互动与争鸣；多元化的史学理论、观念被运用到史学研究实践中，但是经常可以看到对域外史学生吞活剥的复制和移植，甚至盲目地追随；史学理论成为一个学科，但迄今并没有严谨、独到的史学理论体系推出，以各种“史学概论”为代表的试图覆盖史学理论学科的系统性论著都把重心放在布局和行文的周至性方面而缺乏创见。所以，史学理论研究的推进，依然任重道远。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问题。

史学理论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它的对象是人类历史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人类世界的历史学有共同的本质和方法，其间的差异并不影响史学理论有一种世界水平。但是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没有显著地位。中国历史学家的许多实证性著作拥有世界范围的读者，但是没有一部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已经形成国际影响。所以，史学理论要推进，就要直接面对当代世界范围史学理论的高水平前沿问题。而这类问题，主要在于历史认识论、知识论层面。中国史学理论界曾经长期探讨争鸣的一些重大问题，对于阐释中国历史是重要的，但其症结，部分是理论性的，部分是社会性的。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盛行的阶级斗争史观，理论含量并不高，“文化大革命”如果不结束，这种历史观会持续流行，“文化大革命”结束，这种历史观随之寿终正寝。在国际史学理论界，这类问题却是早就已经澄清的。因而，这类问题，至多是半理论性的。所以，我赞成对中国史学理论界曾经争鸣的一些理论性话题继续研究，但不认为需要全面恢复对那些话题的讨论，也无须一一追求公认的回答或终极看法。与之相比，甄别出一些对于历史认知具有根本意义的话题来研究，更具有纯粹史学理论的意义。

比如，那个古老的康德式的问题——历史认识如何是可能的，至今盘旋在全球范围史学研究者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工作中。早期现代历史学以实证主义作为基本特征，经过“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冲击和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解构，已经显露出严重的缺陷。但后者虽然足够有力地指出实证主义历史学的缺陷，其替代的主张和实践范例却带着同样严重甚至更严重的缺陷，突出地表现在当代历史学事实判定中随意性的增强、过度诠释，这在当下西方、中国的历史学观念与实践方式中都有大量表现。近年，亚洲国

家围绕日本侵略历史问题而发生的“历史观”分歧也是一个突出的例证。这种分歧固然突出地表现在政治领域，以涉事方利益和政治立场差别为基础，但所有“历史观”都涉及理论，或者说所有历史观都可以从理论角度加以解析。当对“南京大屠杀”这样亲历者尚存、遗迹尚存的大板块基本事实否定的说法能够公开或隐晦地流行时，历史学家需要思考，为什么在一些人看来证据累累的重大事实在另一些人的历史叙述中会扑朔迷离，否定历史事实的观念根源和可能的理论根源在哪里？如果历史学家不能阐明这些问题，历史学依然是理论贫困的。历史认识为什么是可能的，我们依据什么来判断一种历史认识比另一种历史认识更可靠？这类关于历史学本身性质、价值的基本问题，至今依然有待深入阐释。

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其实正是从历史知识的性质这一个原点出发来阐发其论说从而形成普遍影响的，可惜其努力的方向偏重于说明确切历史认识的不可能性，而不是说明其如何才可能。因此，其解构的对象不限于实证主义历史学，而且包括历史学本身。历史学如果无法达成对历史事实的确切认知，历史学存在的理由就被极大削弱。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以各种方式改造历史学的尝试也颇流行，而且常常可以看到宣称历史学发生了什么“转向”之类夸张的说法。如果浏览最近在中国召开的世界历史学大会的论文题目，可以看到很大比例的论文是跨学科的，有些甚至很难说是历史学性质的，历史学似乎正在被社会科学和种种新文化思潮吞没。这很可能也与人们对历史学本身认知能力和信心的动摇有关。即使这是国际范围历史学的一种趋势，我还是认为，历史学有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认知功能，史学理论要在这种潮流中阐明历史学的独立性。

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对实证主义的批评，揭示了传统实证主义历史学处理历史证据时的粗糙，同时在自己的历史研究中也放大了处理历史证据时的随意性和过度诠释倾向，甚至带动起历史阐释中过度追求奇幻效果或炫示文辞雄辩深奥的风气。历史学虽然不能用实证的方式重建所有人类以往的事实，但只能接受不违背证据原则的历史认识。权衡两者各自的得失，历史学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中和，需要摸索一种传统实证主义与各种批判学